

書叢文譯

屠格涅夫著

文學回憶錄

蔣路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著

蔣路譯



文學回憶錄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二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者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錄 憶 回 學 文
著 夫 涅 格 屠
譯 路 蔣

角 九 圓 金 價 定

目次

代序	一
I. P·A·普列特涅夫家的文藝晚會	九
II. 回憶柏林斯基	三一
III. 果戈理	九七
IV. (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萊蒙托夫，查果斯金) 關於父與子	一二五

代序

一八四三年將近復活節的時候，彼得堡發生了一件事，一件本來無關緊要，而且老早被人淡忘了的事；那就是——一篇署名 T·L，題作巴拉莎的小敘事詩的出現。這 T·L 卽是我，^①這篇敘事詩可以看做我的文學生涯的起點。從那時算起，差不多過去二十五年了，在這兒，我想趁着我的作品發行新的版本之際，來跟讀者談談，把四分之一世紀當中積壓在我心裏的種種回憶告訴他，縱令一鱗半爪也好……*Grande aevi spatium!*（拉丁文：

① 巴拉莎的全稱是巴拉莎詩體小說，一八四三年春天出版，因爲那風格的新穎和情感的健康而引起普遍的注意。——譯者。

② T·L 是屠格涅夫父母姓氏 Turgenev 與 Lutovinov 兩字的頭一字母，他的初期作品多署此名。——譯者。

一個長的時間——我不敢許給讀者什麼非常新奇的，『富于刺激性的』東西；我也要預先奉告他：一定有許多地方還沒有說到或者言未盡意。其所以有這類遺略，是不難解釋的。我們都知道，自從一八四三年以來，人事代謝，有的變了，有的消逝得無影無蹤了……但今天的實際與當時的史蹟之間的聯繫，尙未完全斷絕；好些人都還健在——何況遺留下來的不僅是人而已。而唯獨關於那最終地退下了舞台的事物，我們纔能說出真理，說出公允的，全面的真理來。因此，我決計使我的回憶錄只限于若干斷片，若干零碎的篇章；我期望它們中間會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至若形式上的統一和敘述的順序，我早就放棄了。不過我認爲必須預先報導一些于我直接有關的事實，因爲它們曾經決定了我的事業的出發點。

我于一八三七年唸完聖彼得堡大學文科，第二年春天便去柏林留學。我纔十九歲；但我早就夢想過這次旅行了。我確信在俄羅斯只能學到一些預備性的知識，而真正學問的源泉是在國外。其時聖彼得堡大學的教師之中沒有一個能夠動搖我這信念，況且他們自

● 這是拉了史學家 Tacitus 的話，指人一生的時間。（按本書內關於拉了文句子的腳註都

是由編者轉請徐家匯顧神父代爲查明補入的。）

已也都充滿了這種信念；連那以烏瓦羅夫伯爵●爲首的教育部也抱着同樣的見解，經常用公費派遣青年進德國各大學深造。我在柏林約莫默了兩年（前後兩次）。頭一年跟我一道在大學聽課的俄羅斯人當中有N·斯坦格維奇，格拉諾夫斯基和傅羅洛夫，●第二年則有日後名震遐邇的M·巴枯甯。我學的是哲學，古代語言與歷史，並在威爾德（Verder）教授指導之下特別熱情地研究黑格爾。爲了證明那時在國內大學裏所受的教育是多麼不完全，我只消引徵一件事就夠了：我在柏林聽楚姆卜特（Zumpt）講拉丁古代史，聽波克（Bok）講希臘文學史，但因爲根底不好，回家之後還不得不死記拉丁文和希

● 烏瓦羅夫（S.S. Uvarov, 1786—1855）伯爵，著名的御用理論家，曾任教育部長，科學院院長等要職。——譯者。

● 斯坦格維奇（N.V. Stankevich, 1813—1840）啓蒙運動家，三十年代莫斯科哲學文學小組的領袖。——譯者

格拉諾夫斯基（T.N. Granovsky, 1813—1855）知名的黑格爾主義者及西歐派首領。——譯者。

傅羅洛夫（N.G. Frolov, 1812—1855）作家。——譯者。

職文法。可是我還不算一個太蹩腳的學士呢。

青年人——我的同輩——的渴望出國，頗像斯拉夫人之向海外瓦朗格安人尋找首領。●我們每個人恰好也感覺他的國土（我並非泛指祖國，而是指各人心裏所蘊藏的精神與智慧）是廣大而肥沃的，但它缺少秩序。我可以說說我自己：我個人十分清楚地知道，這樣離鄉背井，這樣勉強割斷我和我出生的生活環境之間的一切聯繫及紐帶，是有害的……然而我無可奈何。那種生活環境，那種社會，尤其是我所隸屬的那個社會圈子（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地主與農奴的圈子——全都使我無法留下來。相反地，我在自己周圍所看見的一切，幾乎都在我心頭激起不安和憤懣的感情，最後並令我發生憎恨。我不能長此動搖下去。或者屈服，溫順地循着老路子默默地走去，這是常軌；或者立刻跑開，擺脫『所有一切』，甚至拋棄我內心覺得珍貴和親切的許多物事。我就這麼做了……我縱身一跳，鑽進『德意志海』裏，讓它洗滌我，使我甦生，而臨末，當我從它的浪濤之中游出的時

● 瓦朗格安人（Varangian）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居民，據說，九世紀時，斯拉夫人因為

本國秩序混亂，羣龍無首，曾派人赴斯堪的納維亞邀請挪威公爵劉里克（Rurik）兄弟

來俄羅斯爲皇——譯者。

候，我終於變成一個『西歐主義者』並且一輩子都如此了。

我的某些同時代人走的是另一條路，是否定性較小的路，但他們也獲得了我所憧憬的自由與自覺，我連想都沒有想到要非難他們……我只願聲明一句：我沒看見自己面前有別的道路。我不能和我所憎惡的東西獸在一起，跟它呼吸同樣的空氣；這大概是由于我缺乏相當的忍耐力，性格也不夠堅強的原故罷。我必須離開我的敵人，以便從我所在的遠方更猛烈地打擊它。照我看，這個敵人有着一一定的形態和一定的名稱：這個敵人即是農奴制度。在這名義之下，我凝聚和集中了一切，決心對它作戰到底——我發誓永遠不跟它妥協……這就是我的漢尼拔誓約，而當時向自己立下這種誓約的還不止我一個人。我到西歐去，也是爲了更好地履行它。我並不以爲我的西歐主義信仰會使我失掉對俄羅斯生活的一切同情，對它的特徵及需要的任何理解。獵人日記，這些曾經令人耳目一新，後來却被遠遠地超過了的習作，便是我在國外寫成的，其中有幾篇還是在爲『到底回國不回

● 漢尼拔 (Hannibal, 247—183, B. C.) 迦太基名將，當其九歲時，曾在祭壇前向乃

父宣誓，謂將獻身祖國，消滅羅馬；此後凡表示終生不渝之誓言皆稱爲『漢尼拔誓約』。

譯者。

呢？』的問題而躊躇不決的苦惱期間寫成的。人們也許會反駁我，說這些作品裏所保存的那一點點俄羅斯精神並非我的西歐主義信仰之賜，而是與這信仰及我的意志毫不相干的。討論諸如此類的題目殊爲困難，我只知道，假使默在俄羅斯，我準寫不出獵人日記來。同樣，我要說，某些穩健甚至熱情的，然而學識譚陋的愛國者硬要在俄羅斯與西歐之間掘下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而血統、語言和信仰却又這麼緊密地把兩者聯繫着——這鴻溝，我也是從不承認的。依照語言學者和人類學者的看法，我們斯拉夫民族不是構成印度—日耳曼人種的一個主要支脈麼？如果我們不能否認希臘對羅馬，以及這二者對日耳曼—羅馬世界的影響，那末，又有什麼理由不准這個無論怎麼說都是同族同種的世界對我們發生影響？難道我們竟是如此缺少獨立性，如此脆弱，以至應當害怕任何外來的影響，帶着小孩似的畏懼厭棄它，唯恐它會損害我們麼？我認爲不然；我認爲，恰恰相反，即使把我們推到海裏去，我們的俄羅斯本性也是洗不掉的。否則我們的民族何至于這樣不長進！我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判斷：我的飯依西歐生活原則，却並未妨礙我對於洗鍊的俄羅斯語言之敏銳的感受和熱烈的愛護。我記得，儘管祖國批評界把我攻擊得體無完膚，却從未責備我說我的語言是不純粹，不正確的，我的文體是向外國學來的。

可是——「*Basta così*」(意大利文：夠了。)關於我個人已經講得夠多，我要說說別人了。這于讀者于我自己，都會更有趣些。讓我附註一下：我的回憶錄(我決心將它交給公衆去評判)中的一部分是照年代次序編排的，其中第一篇所記述的是一八四三年以前的事。

巴登—巴登，一八六八年

I P · A · 普列特涅夫家的文藝晚會

一八三七年初，我，聖彼得堡大學文科三年級生，應了俄羅斯文學教授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普列特涅夫的邀請，去參加他的文藝晚會。那以前不久，我曾經把我的繆司（Muse）——如像舊時所說的——的初期產兒之一，一篇史詩體的幻想劇，題名斯節紐（Сте-нио）的，交給他評閱過。在後來一次演講中，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帶着他那慣常的親切態度分析了這篇十分可笑的，用孩童的拙劣手法盲目摹擬拜倫的曼菲列特的作品，不過並沒有舉出我的名字。他走出大學，在街上碰見了我，便把我叫到身邊，父親似的斥責我，但

● 普列特涅夫（P. A. Plenev, 1792—1865）詩人，批評家，彼得堡大學校長兼教授。

——譯者。

● 繆司（Muse）希臘神話中司文藝與美術之女神。——譯者。

又添上一句，說我『還有點兒小才氣！』這句話鼓起了我的勇氣，於是我又交了幾篇詩給他，他挑出兩篇，一年以後發表在普希金遺下的現代人。第二篇的題目我不記得了，第一篇則是歌頌『古橡』的，開頭是：

『一株古橡』

——威嚴的林中之王

把它那枝葉繽紛的腦袋

● 現代人，俄羅斯文學史及社會運動史上最重要的雜誌之一，一八三六年由普希金創刊于

彼得堡，次年普氏逝世，乃歸普列特涅夫接辦，但讀者甚少。四七年起涅克拉索夫與巴納耶

夫任該刊主編兼發行人（四七至四八年其批評欄編輯爲柏林斯基），撰稿者盡是當時

的一流天才。一八五六年後契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相繼加入編輯部，該刊遂成

爲革命民主派的講壇，而與自由主義作家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托爾斯泰等日益疏遠，雙方

終至決裂，此後其撰稿人多係新進作者，六二年因契爾尼雪夫斯基被捕，曾停刊半載，六六

年被查封。——譯者。

這是我發表在刊物上的第一篇東西——當然是沒有署名的。

我剛踏進彼得·亞方山大羅維奇的前廳，便碰見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已經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正在向主人告別，用深沉的語音叫道：「對呀！對呀！我們的部長們真好！確確實實的！」——於是笑着走出去了。我只來得及注意他那白皙的牙齒和活潑的、靈敏的眼睛。

當我後來知道這人就是我迄未謀面的普希金時，我是多麼懊喪，多麼氣惱自己的遲鈍啊！在那個時候，普希金對於我，一如對於我的許多同輩，乃是半神明似的人物。我們簡直五體投地地崇拜他。大家知道，最近以來，崇拜權威是要遭人恥笑，非難乃至唾罵的。誰要承認崇拜權威，就無異在自己身上打下一記烙印，表明他是一輩子沒有出息的人。然而讓我提醒提醒我們嚴厲的青年裁判官們罷：「權威」這兩個字的涵義本來並不壞。有各種各樣的權威。以我所記得的而言，我們（我是說大學裏的同學）當中誰也不想僅僅因為一個人富裕、重要或者擁有顯貴的官爵，便在他面前低頭。這種誘惑於我們毫不相干，反之：

：甚至偉大的智者也不足以使我們動情；我們需要領袖；但在我們心目中，唯獨那有著澈底的自由信仰，幾乎是共和主義信仰的人，纔真配受到熱烈的愛戴，也唯獨在這些人身上我們纔看見了自己的導師與領袖。再說，我以為這類狂熱，甚至過份的狂熱，原是青年心靈的特色；但青年的心靈決不會因為一種抽象的理想而燃燒起來，無論這理想是多麼美麗與崇高，如果它沒有化身為一個活人——導師——的話。現在的一代跟當時的一代之間的全部差異或許就在於：我們並不以我們的偶像和我們的崇拜為恥，反而引此自豪。無可爭辯地，倘能獨樹一幟，固然是件值得尊敬的好事；誰沒有達到這地步，便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但問題就在這兒：必須達到這地步，必須爭取這地步，如像爭取宇宙間一切美好的事物那樣；可是在一位傑出的領袖的旗幟下來開始這爭取，却是最便當的。然而也要考慮到：今天的青年人已經有了另一種觀念，另一種見解；比方說罷，在現代，假使我們集團中的誰企圖對年輕的一代要求『尊敬』我們大概會取笑他——我們簡直會感到受了侮辱的罷；『這對於老頭子們是好的，』我們會想，『而我們所需要的只是自由，我們還要爭取它罷。』誰是誰非——從前的人呢或是現在的人——我不敢斷定；本來，青年的願望總是大公無私的，正當的；他們的目標相同，不過名義變過罷了。也許，當現代青年的一

般水準更提高，當他們的任務更艱巨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尊敬人家的罷。

我還見過普希金一次，那是他逝世前幾天，在恩格利加特大廳的音樂朝會上的事。他站在門口，靠着側柱，雙手環抱着寬闊的胸脯，帶着不滿的神情東張西望。我還記得他那褐色的，不大的臉孔，阿非利加式的嘴唇，微露的白哲的大牙齒，下垂的頰鬚，高高的前額底下那對烏黑的，含着怒意的眼眸，幾乎看不出的眉毛以及鬚曲的頭髮……他也向我投過急速的一瞥；我傻里傻氣地死死盯住他，這大概在他心裏引起了不愉快的印象，他似乎愠怒地聳了聳肩——總之，他情緒很惡劣——便走到旁邊去了。過了幾天，我看見他躺在棺材裏，於是隨口低吟道：

『他一動不動地躺着，他那

額頭上死氣沉沉的平靜多奇怪啊……』

● 這是普希金描寫詩人連斯基跟奧涅金決鬥而死的遺容的詩句，見歌根·奧涅金第六

章第三十二節——譯者。